

在不平凡的革命道路上沉着前進

——紀念陳翰笙同志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

薛暮橋

編者按：為祝賀中國著名的教育家、經濟學家和文化出版界老前輩陳翰笙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和他的九十誕辰，我們特請陳翰笙的老戰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寫一篇紀念文章。薛老把他剛剛寫完但仍在改寫的一篇初稿寄了來，囑我們選稿刊登。現在發表的，就是該稿的摘要。

薛老這篇文章，重點闡述了陳翰笙從事中國農村經濟調查的重大貢獻，但通過陳翰笙自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學任教以來的歷程，也為我們展示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史實。在這裡，我們謹向為中國革命事業奮鬥一生、至今仍誨人不倦的陳翰笙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並像薛老在文末所說的一樣：祝翰老健康長壽！

陳翰笙同志於1924年4月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聘請，擔任北京大學史學系的教授。由於他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又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對各國歷史、政治、經濟情況有淵博的知識，所以很受當時也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釗同志的賞識。陳翰笙任教期間，結識中外名流學者，消息靈通，經常為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國際通訊》寫時事評論。這些政論大部份稍加修改，又在國內的《現代評論》發表，現在在《現代評論》上還能查到的文章就有53篇。正是這些文章，為他建立了在國內外的聲望。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直下武漢，1927年1月國民政府在武漢成立，陳友仁任外交部長，聘請陳翰笙當外交部的顧問。到武漢後不久，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在上海、武漢等地屠殺共產黨人。陳翰笙處境危險，經北京塔斯社主任明欣聯繫，化裝商人由天津去日本，經伯力前往莫斯科，在共產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結束了他在北京大學三年的教授生活。

陳翰笙原來是研究歷史的，他對世界史有淵博的知識。但其後經過同蔡和森同志的一次談話，使他改變了主要研究方向，知道研究中國問題首先必須研究農民問題，乃決心運用他研究世界歷史的知識，應用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

1929年陳翰笙從蘇聯回國，當時蔡元培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聘請陳翰笙到社會科學研究所去擔任領導工作。翰笙就招收王寅生、錢俊瑞、張錫昌、姜君辰、張稼夫、劉端生、瞿明宙、劉懷傳、秦柳方等人，進行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和保定農村經濟調查；與此同時，又北自黑龍江、南到廣東進行農村經濟調查，孫治方和我後來也參加了調查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此後若干年我們所進行的農村經濟調查，積累了大量的有科學分析的資料，充分證明我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同胡說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托洛茨基派和否認中國存在封建剝削關係的各種改良主義派別進行理論鬥爭



陳翰笙（中）同經濟學家薛暮橋（左）、李崇威在一起

出了重要的貢獻。

我是在1932年初“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時期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的。當時我們除繼續整理農村調查資料外，還在翰笙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救國活動。這時羣衆抗日救國運動十分熱烈，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民權保障同盟，翰笙同宋、蔡都有經常來往，也參加了這個同盟。不久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被暗殺，國民黨把懷疑的目光投向翰笙，下令把社會科學研究所搬到南京。但是，陳翰笙並未放鬆農村調查工作，他得到國民黨農村復興委員會孫曉村的支持，用該會的名義和經費做了陝西、河南、江蘇、浙江四個省的農村經濟調查，並用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名義由商務印書館精裝出版。現在這些調查報告在各大圖書館仍完好地保存着。

由於國民黨的種種壓迫，我和錢俊瑞等先後離開社會科學研

究所，1934年陳翰老也被迫退出。1933年初，廣西師範專科學校校長楊東莪寫信請翰老推薦一位農村經濟教師，翰老介紹我去，臨行前他囑咐我要利用教書機會，做一個廣西農村經濟調查。我在向學生講授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知識以後，利用暑假機會，組織學生回鄉進行農村經濟調查，我自己也在蒼梧、邕寧、龍州、柳州等地進行了一個半月的調查。

1934年5月我從廣西回來，路過廣州，陳翰老正率領王寅生、孫治方兩人作廣東省的農村經濟調查，他把我留下來幫助他們做調查材料的整理工作。廣東省調查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館出錢，翰老自己執筆寫調查報告，英文稿由太平洋國際學會出版，書名是《華南農村經濟問題》，中文版由嶺南大學出版，書名是《廣東農村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出版後不久，蘇聯把它譯成俄文發表，給這篇調查報告以高度的評價。翰老為此調查報告日以繼夜地工作，他的工作效率令人敬佩。在這幾年的調查中，在翰老領導下我們不但完成了好多本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調查區域遍及華北、華東、華南，而且每到一地調查就吸收一部份青年參加，使他們也願意跟着從事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成為此後組織農村經濟研究會的骨幹。

在這以前，陳翰老還寫了幾本有關農村經濟問題的著作，重要的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之發軔》、《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1929年），《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係》（這是翰老根據歐洲歷史所寫的理论與實際相結合的著作）、《難民的東北流亡》（1930年）等等。他的著作，在國內外都有重要影響。

1933年陳翰老看到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的陣地即將崩潰，所以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當時我還在廣西教書，收到錢俊瑞、張錫昌的來信要我也參加該會的籌委會。1934年7月，陳翰老、王寅生、孫治方和我同回上海，當時錢俊瑞、姜君辰、張錫昌也在上海工作，就正式建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大家公推陳翰老任理事長，中華農學會（農業經濟學教授們的組織）的領導人吳覺農為副理事長，孫曉村、馮和法、王寅生、錢俊瑞、姜君辰、孫治方、張錫昌和我也參加了理事會。農研會成立後的首要任務，是出版《中國農村》月刊，由我和張錫昌、陳洪進（翰老在北大教書時的旁聽生，深受翰老器重）負責實際編輯工作，對外由馮和法任主編。吳覺農、孫曉村任該刊的發行人，通信處是農村復興委員會，并由翰老請蔡元培先生為封面題字。該刊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辦好了登記，創刊號於1934年10月10日正式出版。不久張錫昌、陳洪進相繼離滬，編輯工作就由我和孫治方負責，馮和法協助。陳翰老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和《中國農村》爭取公開合法地位，放慮得無微不至。《中國農村》一直能夠延續到抗日戰爭後期，在被查封後又以副刊的形式在《大公報》等報紙繼續出版，直到全國解放，這同翰老的精心策劃是分不開的。

《中國農村》出版後不久，共產國際的駐滬機關被破壞，陳翰老逃亡國外，先後在日本、蘇聯、美國從事研究和著書工作，1936—1939年在紐約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編。

1939年陳翰老回到香港，主編《遠東通訊》半月刊，并幫助宋慶齡和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創辦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任執行秘書，募集國外捐款在各解放區辦了許多小工廠，對發展小手工業和製造武器彈藥有一定的貢獻。1940年曾到雲南西雙版納調查土

地制度，發表調查報告。1942—1944年在桂林繼續推廣工業合作工作。1944—1946年去印度德里做研究工作，接着又在英國新聞部遠東局研究部編纂《遠東敵佔區動態季報》。1946—1950年去美國任大學教授和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同時研究南亞經濟。陳翰老不但勤於作實地調查，而且勤於到圖書館去收集豐富資料，所以他的著作研究範圍的廣泛是罕見的。

新中國成立後，陳翰老在1950年初回國。周恩來總理同他談話，要他當外交部副部長。翰老表示一不做官，二不求名，因此當了外交部的顧問和外交學會的副會長。他對在我國服務的外國專家十分關心，並常接待外國來訪的學者專家，向他們介紹新中國的情況。他還擔任《中國建設》的副主編，從1952到1963年在該刊發表文章26篇。

陳翰老以他豐富的外交經驗，參加了許多國際會議。1951年2月出席世界和平大會，任理事會理事。同年10月參加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緬甸。1952年2月任國際經濟會議中國委員會全國籌備委員會委員，3月赴莫斯科出席國際經濟會議。1952年任中印友好協會副會長。同年10月任中國新聞社理事。1954年5月任對外文化協會理事。1955年6月出席赫爾辛基世界和平大會。12月伴同宋慶齡副主席訪問印度和巴基斯坦。1956—1966年任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1956年2月任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1956年3月任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委員兼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同年3月29日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委員會代表團，赴瑞典討論國際裁軍和禁止核武器問題。11月5日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國家。1960年出席亞洲團結會議，1961年任亞洲學會理事。1964年又任外交學會副會長。在這時期，陳翰老利用他對國際問題的淵博知識，在外交戰線上顯示了卓越的才能。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陳翰老也受到了林彪和“四人幫”的迫害。這時他仍不放鬆他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他繼續收集在三十年代開始的華僑出國史的資料，編寫成巨著，目前正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1973—1980年他任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顧問，可是他雙目接近失明，每天請人爲他讀外國報刊的重要新聞。他決心利用晚年的餘熱，培養青年學生學習英語，經常去他

陳翰笙（中）同《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右）、
《滬港經濟》副主編楊小佛（左）在一起

